



## 反省的现代性：从《坂上之云》看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席伟健<sup>1</sup>

### 摘要

《坂上之云》原为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所撰以 1904 年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小说，2009 年 11 月底，该小说作为“大河剧”被搬上电视荧屏。通过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观众可以透析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政治价值变迁。作为亚洲最具有经济实力的现代法治国家，日本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值得当代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明治维新所创造的近代日本社会的悲剧命运——在技术、制度上迅速实现转型的日本，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战争的灾难带到亚太广大地域；不过，在战争的废墟上，日本又得以迅速崛起。在上述历史现象中，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外，对于其本国既有政治传统的进一步发掘，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理论上的探索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坂上之云、现代中国学、反省的现代性

### I. 所谓“司马史观”与日本近代的相关思想问题

《坂上之云》原为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所著，以 1904 年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故事的主线为来自四国松山的三个青年——分别加入日本帝国海军和骑兵队伍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以及新时代文艺的倡导者正冈子规——在明治时代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通过这三个不同个性的历史人物，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明治时期洋溢在日本整个国度上下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的“乐天主义”国民精神。2009 年 11 月底，该小说作为与经典的 NHK“大河剧”具有相似性质的特别剧集被搬上日本的电视荧屏。通过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观众可以了解到 100 年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总的说来，这部将于 2011 年底放送完毕的电视剧集所要传递给

观众的信息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鼓吹过的观点类似，即从本国的传统政治中实现一种朝向现代政治的扬弃，或者说干脆按照西方列强的发展路径，为本国量身打造一种适合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让衰朽的传统农业国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日本很快做到了这一点，而中国却积贫积弱，一再错过历史的机遇。

在当今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话语中，公元 1895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由这一历史事件起，从满清统治集团内的开明士大夫到中国底层知识分子及普通士绅，对于大清王朝居然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击败并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一残酷事实，纷纷产生“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感，并进而认识到，北洋水师失败的缘由已不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器物层面了，社会舆论乃至统治层内部

批判的矛头开始指向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在“中体西用”的喧嚣中，国内众多知识与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触及更深层的所谓“国体层面”，于是“制宪法，开议会”等主张登上历史舞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戊戌变法昙花一现，迅速被清廷保守派镇压。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更成问题的则是，对于这一连串的历史屈辱，论者或是简单地归咎于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顽固不化，或是就签订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的私人节操问题大做文章。相形之下，对于日本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却鲜有真正透彻的反思。

作为亚洲最早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现代转型的国家，日本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教训——在技术乃至政治，社会制度上迅速实现现代转型的日本，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一种“普世战争”的形式将灾难带到亚太广大地域，最终也让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尽管如此，作为研究现代中国学的学者，我们还是不能过于放大日本传统政治及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而必须积极研究同样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何以较中国更加适应现代转型这一宏观的社会问题。

学术无法脱离现实。在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上，普通人未必能与专家学者一样做思维的深度探险，在公共领域内对普通人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工作者。因此，从艺术作品的角度去理解，反思中日两国在现代转型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总体上更有说服力。

回到《坂上之云》这部小说，其作者司马辽太郎作为一个作品发行超过两亿册的作家，他在日本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人的想象。日本学者中村政则认为，现在日本有些人对于司马辽太郎开始有了卡里斯玛式的所谓“司马神格化”崇拜举动，甚至有人（立花隆氏）认为“司马辽太郎超过了司马迁”——当然，这种夸张的褒奖之词显然违背了司马

辽太郎先生给自己起这个笔名的本意<sup>2</sup>。同时，很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人很少有人研究这个作家的思想，也都感到非常奇怪。

概括地说，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这部小说里所要表达的精神就是一种自尊自强的现代国民精神，而他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来自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出生于1923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算是德富苏峰所寄予殷切期望的“大正青年”——的司马辽太郎曾经作为装甲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对于他的创作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终其一生，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民族变得不明智了呢？”“日本是什么样的人？”总之，这些问题与孕育出了歌德和贝多芬，由一部民主宪法维护的魏玛德国何以蜕变成了纳粹国家一样难以琢磨。因此，他认为“昭和初期是日本近代的异胎”<sup>3</sup>。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告诉读者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他毕竟不是专门做理论研究的学者，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他对日本二十世纪历史的总结——“光明之明治”，“幽暗之昭和”却深入人心，所以不可避免地与军国主义混杂在一起。他的这种史观，被简称为“司马史观”，尽管同时遭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日本社会还是受到广泛的欢迎。

众所周知，旧式的武士集团转变为引导日本进入近代的主导力量，因此，依照丸山真男教授的观点，这个统治集团在引导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时候，有选择地根据日本的统治需求来选择学习什么而不学习什么。日本学者莲见和男曾经评价说：日本四面环海，总是借助外来的力量进行改革，从内部未曾发生完全成熟的革命<sup>4</sup>。这个评价触及到了关键——固然，日本的国门是由佩里于1853年打开的，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由于认识到两国体制与国情的巨大不同，在学习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日本迅速转向德意志帝国，于

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在对宪政的本意并未厘清的情况下号称开始宪政建设。因此，日本的近代化恰恰在最重要的心智和思维习惯方面，没有实现竹内好先生所说的“回心”与“抵抗”，只注重学习表层的西方技术，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制度，对于深层的思想大传统，完全没有实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它在用虚构的意识形态——即要求重建亚洲新秩序，建立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来为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证明时，早已在灵魂上成为西方那种偏执狂式的理性主义政治的俘虏。从这个层面讲，体现在《坂上之云》中的那种拥抱帝国主义模式的激进民族主义喧嚣，是20世纪现代性政治的危险产物，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用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话来说，使“光明之明治”变成了“幽暗之昭和”。

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用一种类似于史诗般的恢宏气魄和大历史的视角，作了一个文明发展史的有趣对比：日俄战争之于日本，恰如1812年的卫国战争之于俄罗斯，而遵循相同的逻辑，俄罗斯在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击溃了拿破仑帝国，并以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为它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正名——而克里米亚战争，正是俄罗斯帝国旧统治秩序崩溃的起点。日本的20世纪战争史也遵循了相同的发展路径，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发展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并在这杆旗帜下对亚洲广大地区发动征服战争，同样地，这样的战争，也给日本帝国的旧统治秩序敲响了丧钟。因此，对于日俄战争的胜利，他引用德富芦花说过的“胜利的悲哀”来形容。一方面，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日本来说，物质上没有得到来自俄罗斯的赔款，而且日本因为这场战争，几乎打光了家底。另一方面，胜利让日本的军部势力迅速膨胀，损坏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根基，为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埋下了祸根。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辽太郎对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与其文学前辈德富苏峰一样一再强调其是自卫性质的战

争，这种说法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其原因在于，俄罗斯的1812年卫国战争当中，确实是拿破仑的侵略大军直接攻破莫斯科，摧毁沙皇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俄罗斯人民才奋起自卫。而反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我们至多只能认为它们是日本为了保护，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发动的具有争霸性质，抢夺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殖民地的战争。在这一点上，如果将这两场战争的性质看得与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一样的话，只能说这其中掺杂了司马辽太郎本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由于缺乏对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准确把握，司马辽太郎与其德富苏峰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军国主义的套套逻辑（tautology）。

在一些研究司马辽太郎先生文学作品的中国学者当中，他们利用左翼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司马史观有诸多误解，普遍认为司马史观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嫌疑，甚至在日本本土，2009年底当《坂上之云》剧集上映的时候，仍有愤怒的观众致信NHK电视台，询问播放这样的给军国主义唱赞歌的电视剧的原因。关于司马史观，笔者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根据目前所查阅过的资料来看，司马辽太郎并不是一个眷恋军国主义的文人。他对战争的厌恶，完全是真诚地出于自己的内心，加上他青年时代也饱受战争的苦痛，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军国主义者。那么，为什么在谈论到日俄战争这个历史问题的时候，《坂上之云》字里行间却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呢？司马史观当中的这种文学断裂，如果联系到另外一个日本作家，即竹内好先生在对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不同态度，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个问题。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研究鲁迅文学的权威人物，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他始终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他不禁为这场在他看来是人种之间的战争大幕拉开而感到激动。竹内好与司马辽太郎

两人身上同样出现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断裂，在于他们对于现代性本身的把握不足有关。相比之下，中国的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于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他对现代性的把握更加谨慎，深刻。

## II. 留日期间的鲁迅对于现代性精神内核的把握

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写过的一篇叫做《破恶声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两大思潮进行了批判，一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是激进的世界主义。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鲁迅归纳了其三种主张：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由于《破恶声论》是一篇没有完全写成的文章，鲁迅在文章中主要批判了前两个主张。尤其是关于表现为“崇侵略”的主张的民族主义，鲁迅很不客气地用“兽性之爱国”这样的用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其外在表现为“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其内表现为“孤尊自国，蔑视异方”，且“执进化留良之言”的文化优越感，自以为占据着文明“进步”的制高点，实质却在于“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鲁迅不满于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表现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上的野蛮征服和主从逻辑，认为它是19世纪的西欧文明和亚洲旧传统的问题之所在<sup>5</sup>。

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考证和阐发方面做得极为出色的学者，莫过于伊藤虎丸先生。在他的名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中，他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性，或者说是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的独特性的角度探讨了鲁迅的独特价值，认为鲁迅的价值就在于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鲁迅在日本留学而与西方近代相遇，特别是与尼采的个人主义相遇而形成的，并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

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sup>6</sup>。

《破恶声论》里所指的“恶声”，恰恰是指中国在面对欧风美雨时所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主义”话语。不论是洋务派，科学救国派，启蒙派，革命派，还是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等等，看起来很热闹，弄到最后还是一个吵吵嚷嚷的“无声的中国”。恶声扰攘的中国，却是一个“寂寞之境”<sup>7</sup>。无论那个派别的学说主张，在当时的青年鲁迅看来，都根本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本质，即人之现代化。鲁迅的思想直觉觉察到，与其说人类冲突起源于国家和政府，不如说隐伏于人类的原始本能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改造我们自身，使每一个人成为“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之人，比反对国家和政府，搞暴力革命和夺权更为根本。没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蓬勃昂扬的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要混入“兽性爱国”的杂质。被这种偏激的文明观教育出来的国民，往往“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sup>8</sup>。相形之下，中国的志士仁人，民族主义者一样逃离不了“兽性爱国”的局限——如果说“兽性爱国者”是自我崇拜的话，而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则最崇拜西方的强大国家，同时还瞧不起与中国一样落难的文明古国，诸如印度。鲁迅把这种现象叫做“侮胜民”。这种心态，鲁迅在若干年后的《阿Q正传》里，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不过，当时世界的舆论环境是容不下鲁迅特立独行的思考的，流行的观点将帝国主义说成是“民族之力充沛于内不得不溢于外”<sup>9</sup>的表现，甚至连孙文都将其视为“民族主义发达的最后阶段”<sup>10</sup>。

鲁迅在处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时，出人意料地把“立人”的主体化构造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这就是他发现了“自省”（“内省”“反省”）的意义，通过它，不仅找到了进入与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等相互关系领域的入口和通道，而且把自足的“立人”构造发展为一种开放的，关涉社会，国家关系的“相互主

体性”(inter-subjectivity)格局<sup>11</sup>。鲁迅所强调的“自省”并非儒家式的“内省”“自修”，而是在相互关系中的主体的精神“再自觉”；其触角不仅指向自我，而且指向社会，国家，指向一切相互关系。也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克服单向主体化方案的弊端，通过执着相互性而给人以消灭主从关系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青年鲁迅当年就提出，吾辈青年之要务，在于“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也就是说，让每个中国人经过教育，实现“良心上的自由”，对事情的判断靠自己健全的常识和理性来进行，而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权势。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和“立人”的思想都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但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运动核心在于建构现代国民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以个人对于群体，国家，民族的义务的国民公德为本位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sup>12</sup>。而没有个人之自由的自由，一方面会压抑了坚守独立的个体的创造性，降低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新形式的专制与极权，因而只能是一种伪自由。这种思想根源上的区别，正如伊藤虎丸所把握到的，鲁迅在尼采等大哲的学说中把握到了一种完全与东方文化传统不同的异质性思想内核，即真正的“个”的思想。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鲁迅提出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要求就是“立人”，即塑造越来越多的具备独立人格，有公共责任精神，有文化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大写的人”出来，要求唤醒每个中国人的“心声”，唤醒他们的良知——不是作为启蒙者，而是作为共鸣者——以打破清末中国所呈现的“寂寞为政”的局面。可以说，鲁迅在早年的这个主张，与他以后的文学战斗生涯相比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什么是“寂寞为政”呢？概括地说，这里的“寂寞”，就是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指出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舆论环境。在统治

者层面，一方面是官员越来越脱离实际，为政绩一心逢迎，以上司的是非为是非，对下则脱离民众，不愿倾听底层的声音，甚至压制利益表达；另一方面是官员群体中政治修辞传统的丧失，官方意识形态对于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再有效，对于这个情况，官员也鲜有抱实用主义的态度加以改革的。社会出了问题，不是欺骗就是弹压，导致政府与基层信息沟通不畅，出现所谓“寂寞为政”的局面。

至于在草根民众的方面，就是普遍丧失了公共责任心和德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社会事务永远是“各扫门前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指责民众，将之归因于所谓的“国民劣根性”。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典章文物，礼仪诗教，一度让周边国家的万民为之醉心，四夷来朝的景象在历史上也曾经一再出现。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既然曾拥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其国民何以会有“劣根性”？问题的根本，首先恐怕还得归于统治者。也就是说，统治者的行为模式对于被统治者，永远是“风行草上，必偃”。然而，这需要坚实的社会制度条件：首先，执法部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否则会做不到秉公执法，群众也不会服膺，社会正义就会一再受到伤害；其次，媒体要有一定独立的地位和权力，对政府行为有一定的监督权力，不会受到权力的肆意干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加强公民教育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公民没有公共精神，政府难辞其咎。一言以蔽之，一个现代化强国，靠一群自私冷漠的臣民，甚或叫嚣“强权即公理”的“霸者之民”，都是建设不了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法律条件或许已经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法治所仰赖的道德条件，则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回到《坂上之云》，这样的小说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之所以还能受到欢迎，与日本当前的社会心理不无关系。从日本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来看，终战后美国带给日本的“胜利的悲哀”——即美国为日本量身定做的美式宪政体系，

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哲学从来没有许诺要开启一个美丽新时代的开端，它只是要求达到一个最低目标即可，即便未来意味着所谓“末人”时代的到来，也不再允许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雄心的国家。甚至连好莱坞的导演对于日本传统的湮没也于心不忍，利用汤姆·克鲁斯的《最后的侍》来传播这样一个理念：即在这个消费社会的大环境下，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的自由民主体制所带来物质的虚荣与思想的矮化却足以湮灭一个传统社会的美德与力量。因此，日本在败战后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制度，也包含有其独特的文化伦理传统，我想大多数日本读者在《坂上之云》中感到富有共鸣的，也正是明治时期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乐观向上，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的重振，对于日本走出当前的困境来说是必需的。

1959年，法国后现代政治思想的宗师，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到达日本后，对日本人的历史与伦理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古代武士据以生活的尚武精神有些类似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中主人的箴言：战胜或者死亡<sup>13</sup>。在那里，科耶夫洞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盈着“主人道德”的德性。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认为，虽然武士最充分地体现了冠于其名的伦理准则，但它决不仅限于武士阶级。明治维新后，这种传统的统治阶级的伦理流布到整个社会，形成了强大而危险的为共同体体现身的臣民德性——当然，它决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现代城邦的“公民美德”，而仍是一种利用传统伦理的话语来掩饰的20世纪极权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的集中表现。

### III. 社会学的启蒙：与文学作品保持知识学的距离

在这里，“社会学的启蒙”这个表达法可能涉嫌不够严肃地照抄了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

斯·卢曼所喜欢的用语。在这里笔者用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远没有卢曼本意那么深刻：笔者的意思是，对于作家，在进行涉及重大历史问题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视的意识，要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论述同样问题的专业学术著作，要与自己所论述的对象保持知识学上的距离。如果没有这个反省的态度，那么文学的虚幻与历史掺杂在一起，必然会导致谬种流传。而对于广大读者，也要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增进对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的了解，在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增强自身的鉴别和批判能力，否则就会失去反省的诉求。需要坦白的是，中国现在很多作家，影视制片人在处理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同样存在不够严肃，欠缺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现象，对于历史本身不够尊重，导致民众关于抗日战争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这样一种对于艺术作品进行有意识地批判鉴赏的能力，其重要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辽太郎先生一再强调其作品忠于史实，却仍然发生了这样令人感到遗憾的事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研究现代中国学的学者，在考察现代中国发展现状的时候，也应该摘除所谓“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与研究对象保持知识学上的距离——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在发表过的《文明与文化》这一演讲中，在论及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时，也同样令人遗憾地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个错误与他在《坂上之云》中所犯的错误，根源是一致的。

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舍勒提出，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

的具体的价值评价<sup>14</sup>。从《坂上之云》所描绘的“光明之明治”时代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在那个转型时期体现在普通日本国民身上的精神气质的转变，确实是非常鲜明的。然而，至于“光明之明治”在经历了大正时代的短暂繁荣后，为何会走向“幽暗之昭和”，也是司马辽太郎先生一直苦苦求索的历史难题。日本的败战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较，都可以说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整个民族国家所遭受到的重大挫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历史事件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现代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技术与政治，社会制度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上的转型，简单的工业化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半途而废”，在这个基础上，当代社会理论学界的学者普遍认为，对于现代化，我们早已应该持一种反省的所谓“二阶观察”的态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反省”，不仅仅应该体现在社会运行机制上，也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的教育上——前者属于如何利用社会来制衡国家的问题，而后者则属于如何改进当下的公民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的问题。

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是一个反启蒙主义的启蒙者，一个反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个反民族主义却捍卫民族文化的人物，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物”。这些悖论式的表达不是标新立异的修辞，它们显示的是鲁迅的基本态度：自由平等，扶弱抑强和久远的传统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前提，为了捍卫其价值，就必须拒绝将这些价值纳入现代权力关系的图谱之中。他所谓“人国”（《文化偏至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那种彻底抛弃传统的大同世界，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设想的建立在民族异质性与领土管辖权相互重叠之上的国度。“人国”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状态和产物<sup>15</sup>。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方法具有其典范意义。鲁迅在27，28岁的时候，就把创造一个“有声的中国”——也即“人国”的诞生——看成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对中国

革命的理解，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对人之为人的理解，都需要回到这个出发点上去认识。“寂寞为政，天地闭也！”没有心声，世界也就消失了。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中国心灵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独特追问<sup>16</sup>。我们现在接着鲁迅的发问去考虑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要将启蒙时代那种对于人类理性无限乐观的启蒙——这也是明治初期“乐天精神”的内核——置于一个二阶观察的境地，即我们对于启蒙本身的认识也要启蒙，要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在争论 Intersubjectivity 到底是翻译为“主体间性”还是“相互主体性”的时候，有关哈贝马斯与卢曼那场世纪论战，看看是否需要我们再退一步地遵循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去还原，反省：主体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运用？如果哈贝马斯所期望的共识无法达成，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当前这个咄咄逼人的风险社会？

相比之下，为什么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要比司马辽太郎更值得认真对待，笔者给出的理由是，鲁迅因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文化直觉与知识背景，不自觉地与情绪化地观察社会的思想倾向保持了知识学上的距离，他相对而言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他对启蒙主义的谨慎态度，堪与17世纪意大利先哲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相提并论。

在鲁迅看来，改造社会的希望宁可寄托在身怀“白心”的底层民众身上，也不能指望以哗众取宠的文字来“启蒙”民众的所谓新型知识人身上，因为他们会不加选择地把现代性的精髓和毒液都灌输到民众的脑子里。相同的观点，尼采也曾清楚地表达过：“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有学问，有教养的阶级，以及只理解这个阶级并且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成员的教士们，必须一扫而光。那些仍然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人也将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智能。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败坏才是最大的危险”<sup>17</sup>。讲句题



外话，如果将这个主张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联系起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理念上的惊人一致，即相信常识，相信一般民众的良心自由。这个联系，恰恰是个体理念与制度设计理念的有机联系。

涉及艺术作品与公民教育的问题，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经表示过，我们遵循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要不断地扩大“我们”（WE）的范围，扩大共识，同时一定要坚持，一个值得欲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要远离残酷的。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要有这样的作用，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所以，如果司马辽太郎先生在片面强调日俄战争那虚幻的防卫性质的同时，能够体会到中国东北土地上遭受战争痛苦的人民的感受，那么他可能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对战争本身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不至于产生前面所述那样的文学断裂。一言以蔽之，那个文学断裂来自社会科学知识的欠缺。

前文提到的鼓吹人类历史归宿为所谓的“普遍均质的现代国家”的科耶夫把日本当做后历史社会的“人类”典范——即一个在“无理由的否定”形式中再一次发现否定性的社会。对于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评价，笔者从现代哲学的存在主义向度看这种古老的武士伦理：这种无理由的否定，也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尤其是先秦时代，这甚至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民族的“绝对精神”乃至灵魂的嬗变。虽然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奢侈品，但是反省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它，发掘它，利用现代的科学考察工具让它焕发新生，而不是继续在消费社会的大潮中随波逐流。

回到《坂上之云》这部电视剧集，笔者在观看它的时候，就可以隐晦地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危险倾向。关于作者，我们只能说这个危险倾向来自于他的无心之失，我绝不认为作者有意利用文学作品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因此，对于涉及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与方法进

行辨析，对话，任何道德化，审美化的认识，必将会引导人们重新走进历史的误区。

#### 注释\*

- <sup>1</sup> 天津行政学院
- <sup>2</sup> 中村政则「司馬史観をどう見るか—歴史と小説」，米欧回覧ニュース第12号，平成10年8月30日。
- <sup>3</sup> 中村政则「司馬史観をどう見るか—歴史と小説」，米欧回覧ニュース第12号，平成10年8月30日。
- <sup>4</sup> [日]莲见和男：《对天皇制的神学批判——基督的王权与世俗的王权》，引自[日]土肥昭夫等著《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杨熙楠，铃木正三主编；查常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50~351页。
- <sup>5</sup>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 <sup>6</sup> 王晓初：《“原鲁迅”：在承传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五期。
- <sup>7</sup> 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10月，101页。
- <sup>8</sup>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2-33页。
- <sup>9</sup> 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20页。
- <sup>10</sup> 崔书琴：《孙中山先生与共产主义》，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77页，转引自陈志让：《军绅政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 <sup>11</sup>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7月。
- <sup>12</sup>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223页。



- <sup>13</sup> [加拿大]莎蒂亚·B.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学的根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86页。
- <sup>14</sup>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16页。
- <sup>15</sup>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6页。
- <sup>16</sup> 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10月，111页。
- <sup>17</sup> 参见《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笔记选》，上海三联版1993年版，田立年译，118页，转引自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2000年10月。